

全球智库半月谈

欧洲金融危机中的资源错配

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来我们的所见所学

货币政策导致的债务陷阱

美国的住房政策与城市发展

特朗普在华沙：介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刘立群

史明睿

申劭婧

伊林甸甸

杨茜

章珏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洋	科研助理	刘畅	科研助理
周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欧洲金融危机中的资源错配 7

导读：众所周知，银行资源错配会因向弱势企业配置资金、限制正常企业贷款，从而延长金融危机的时间。本专栏探索了意大利银行在欧洲金融危机前后资本错配的影响及程度。银行资本错配在中长期可能会导致正常企业退出市场，以及生产效率的下降。但是它在欧洲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美国低生产率或成新常态 11

导读：关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趋势的估计大幅度下降，这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下降是永久性下降的担忧。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以及接下来可能的结果。文章认为：第一，中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很难预测，近期的表现并不是可靠的指示。第二，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的平滑估计容易导致对前景的过于悲观。第三，中期全要素生产增长的大幅波动和预测容易混淆。

“智能身份证”助力印度转移支付体系智能化 15

导读：如何确保政府的福利补贴精准地惠及贫困人口，一直是困扰印度政府的一大难题。为了推进“精准扶贫”，印度政府希望借助生物信息识别系统，来挤压其转移支付体系中存在的腐败和灰色地带，并最终推动转移支付体系的智能化。近期，一些经济学者检验了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

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来我们的所见所学 17

导读：亚洲金融危机自 1997 年始于泰国，对亚洲经济、金融和企业产生重大的影响。现如今，亚洲抵御重大经济冲击的能力已大大增强。

聚焦中国

中国的经常账户：外部失衡还是资本逃逸？ 20

导读：本文探究了中国经常账户的异常情况：旅游支出大幅增长。从国际机构的数据和扩大到旅游业的重力方程模型中得出的证据，本文发现 2014 - 2016 年期间中国的旅游中有大量不能用会计因素或经济基础来解释。不明原因的旅游进口与国内增长成反比，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预期正相关，表明这个增长与国外消费商品和服务相比，更可能是国内居民收购外国金融资产。由于这些潜在的伪装外流调整，中国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的经常账户余额可能会高于官方数据 1% 的 GDP，这是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之后显著放缓的时期。

经济政策

货币政策导致的债务陷阱 23

导读：本文作者认为，美联储的通胀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严重的财政混乱，并且将会导致未来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

进口竞争与国内产品质量 26

导读：降低关税促进了国内产品向世界前沿产品的质量升级，但阻碍了质量差距较大国家的产业升级。

亚洲金融危机 20 周年：被克林顿、IMF 和华尔街日报颠覆的印尼政府 29

导读：本文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委员会之争进行了澄清，讲述了美国政府和 IMF 为了推翻时任印尼总统 Suharto 而编造的骗局，以及华尔街日报的不实报道。这是 IMF 在货币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最终结局也并未朝向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发展。

美国的住房政策与城市发展 32

导读：本文讨论了美国住房现状和城市发展的关系，重点分析了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四大住宅项目，提出了收入房价比指标，指出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俄勒冈州和华盛顿等地的房价已超出居民收入可负担的能力，重点批判了各地的城市发展管理政策，并认为城市改造项目存在虚报、增加税收等问题。

IMF 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建议 37

导读：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IMF 一直致力于推动各国的金融系统改革，从而加强各国金融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在最近发布的政策报告中，IMF 强调了推行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的重要性，并且总结了施行宏观审慎政策的几个要点，供各国金融当局参考。

战略观察**特朗普在华沙：介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39**

导读：2017 年 7 月 6 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特朗普在华沙：介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一文，作者主要梳理了特朗普的讲话内容，概括为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实际上是试图通过调整他的主权意识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圈子。他驳斥了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奥巴马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正在寻找建立“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的选择：放弃还是坚持？ 42

导读：2001 年，美国对阿富汗发起了反恐战争，但是直到现在，阿富汗的局势仍未安稳下来。阿富汗武装部队正在逐渐丢失领土控制权，塔利班势力正在日益壮大。作者认为，面对阿富汗的复杂局势，现任美国政府与上任政府一样，只拥有两项选择，要么放弃阿富汗，

要么继续甚至扩大军事存在。作者进一步指出，若放弃阿富汗，则阿富汗终将成为恐怖主义输出国，因此，现任美国政府应综合考虑地区战略，维系战事僵持状态，因为，只有当塔利班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时，它才可能做出和谈选择。

请最终结束朝鲜战争吧 44

导读：1953年，美国和朝鲜签订了停火协定以“结束”朝鲜战争，但是由于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和平协定，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这场战争至今并未结束。朝鲜方面一直十分重视与美国签订明确的和平协定以获得对其主权和政权的认可，但是美国方面一直强调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才能与之签署和平协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坚持朝鲜无核化目标，而实现该目标的关键一步就是与之先签署和平协定。

本期智库介绍 46

欧洲金融危机中的资源错配

Fabiano Schivardi, Enrico Sette, Guido Tabellini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众所周知，银行资源错配会因向弱势企业配置资金、限制正常企业贷款，从而延长金融危机的时间。本专栏探索了意大利银行在欧洲金融危机前后资本错配的影响及程度。银行资本错配在中长期可能会导致正常企业退出市场，以及生产效率的下降。但是它在欧洲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编译如下：

金融危机的一大表现是银行业的衰退。众所周知，资本错配的银行可能会将资源配置给弱势企业，进而缩减正常企业的资金，从而导致危机延长（这一现象被称为“僵尸贷款”）。日本在“失却的十年”中的表现（Peek and Rosengren 2005, Caballero et al. 2008）和欧洲金融危机（Acharya et al. 2016）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因为数据和方法论带来的困难，度量衰退的银行业因资源错配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另外，在衰退时期，不是所有僵尸贷款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贷款给弱势企业可以使它们得以维系，从而防止裁员并缓解衰退时期总需求下降产生的负外部性（Mian et al. 2015）。公司破产也可能扰乱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无法回复（Barrot and Sauvagnat 2016）。

在近期文献中，我们研究了意大利在欧洲金融危机前后资源错配的程度和结果（Schivardi et al. 2017），并提出了两个问题：

1. 怎样的特性会导致银行产生僵尸贷款？
2. 僵尸贷款会因经济活动缺失和实体资源错配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我们的结果是：

资本错配的银行更可能贷款给僵尸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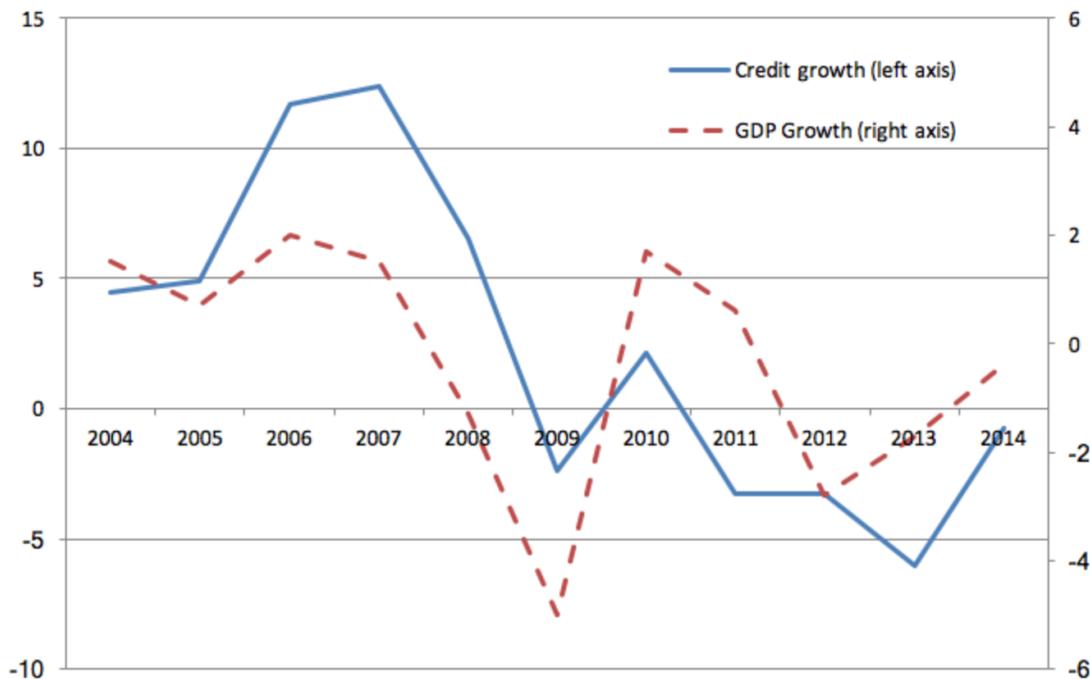
资源错配会提高正常公司破产的可能性，降低僵尸企业破产的可能性。

但是，资源错配对正常公司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分配的影响微乎其微。

数据和实证研究

我们使用了一个几乎涵盖所有 2004-2013 年意大利银行与企业关系的数据库。在意大利研究这个问题十分合适，因为金融危机引发了长时间的经济衰退，使得 GDP 累计下降了 10%。这与银行资源配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图 1 意大利资本错配与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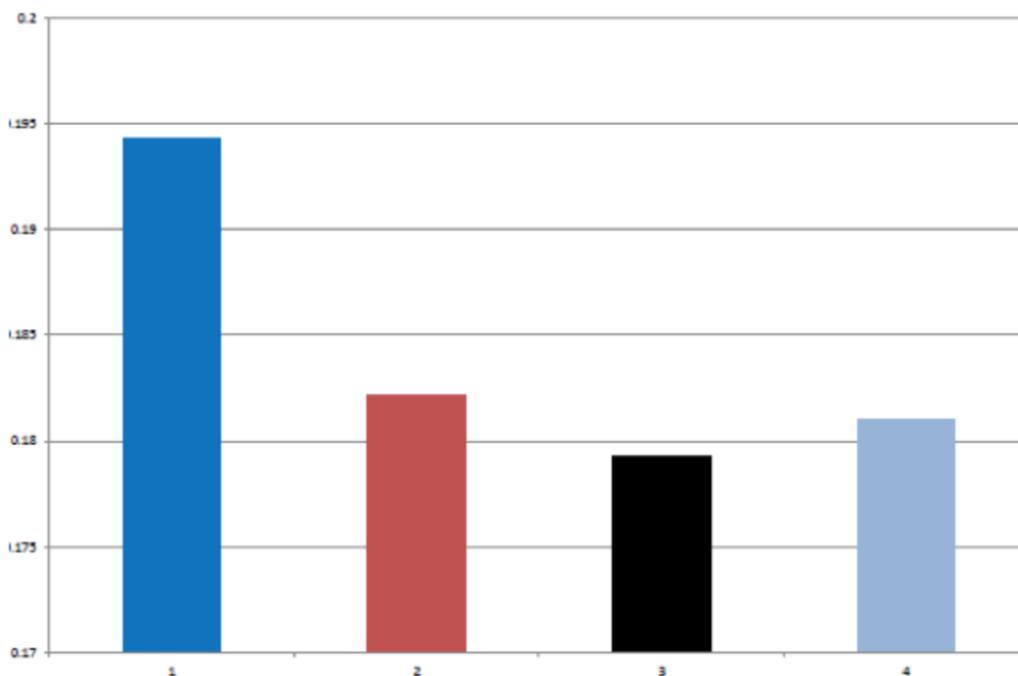


与其它欧洲国家不同，意大利没有吸收公共资金为银行系统注资，也没有成立影子银行来吸收不良贷款。所以，意大利的银行仍然面临大量的不良贷款，一些银行也难以达到危机过后更加严格的规则。这一问题持续至今，也成为意大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们观测了所有公司（包括小公司），并专注于资源错配现象，也就是将资金借贷给明显无法延续的企业现象。僵尸企业指那些债台高筑并且资产回报率远低于行业内正常水平的公司。

为了研究哪些特征导致了僵尸贷款，我们将公司层面的增长率与以监管资本率为主的几个指标进行了回归。图 2 显示，资本较少的银行具有更高的僵尸贷款比例。

图 2 银行贷款中僵尸企业的份额



此类回归的难度在于可观测的资源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单独表现出供给的作用，我们发现意大利公司大多从多个银行贷款。这使我们得以在控制公司个体原因的情况下比较不同银行对同一公司的贷款。如 Khwaja and Mian (2008)所提出的，这使得我们可以控制公司资产需求，只分析供给层面的影响。

衰退的银行业确实会引发僵尸贷款

我们发现，在 2008-2013 年间，资本率低于平均水平的银行向僵尸企业提供的贷款比普通银行多两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对不同定义下的僵尸公司和资本度量手段都适用。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果同样适用：2008 年以来，弱势银行停止向企业提供贷款的几率比普通银行低一个百分点；对于僵尸公司，这个几率就会低 0.7 个百分点。这些结果都说明弱势银行更可能导致资源错配。

这一结果对实体经济重要吗？

我们分析了僵尸贷款对正常公司的影响。通常，人们会将公司盈利的指标对同行业僵尸公司的指标回归。与 Caballero et al. (2008)一样，我们将行业效应

固定，以消除行业僵尸贷款增加和企业产出变动带来的负面冲击。但是这一方法有两个缺点。其一是这种方式只能度量僵尸贷款对正常企业的影响，无法度量它对僵尸企业的影响；其二是我们无法度量行业冲击对正常企业和僵尸企业的不同影响。比如，当公司盈利水平呈现正态分布的时候，这一方法使得导致整个分布向右偏移的行业冲击会对僵尸企业盈利水平与正常企业盈利水平的相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度量方式来分析正常企业与僵尸贷款间的关系。因为银行借贷和产出都呈现出区域化特征，我们在控制年份与省份二元变量的情况下，分别分析了不同省份的公司，并且研究了在给定省份中银行平均资本化程度影响该省企业产出的程度。银行常常是跨省的，集中于单独省份的银行非常少。因此，银行资本化程度不太可能因省份的变动而显著变动，所以我们将银行资本化程度作为度量公司盈利水平变动的外生变量。

我们发现银行资本错配对正常企业衰退期间增长率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结论对多个经济活动的指标都适用，如工资（代表就业率），股票和盈利。其原因是尽管银行资本错配会减少正常企业的盈利，但它也会提高僵尸贷款的增长率。所以绝对影响较小。

这一发现似乎与以往文献的研究成果截然不同。贷出僵尸贷款的银行至少会从两种途径伤害正常企业：其一，减少了正常企业可以获得的银行资源；其二，僵尸企业在生产中会有竞争优势。但是，起码在经济衰退时期，僵尸贷款会对经济产生正面效应。它可以防止弱势企业的收缩与破产，从而缓解总需求带来的负外部性。这一机制在以往文献中很少被提及，但是数据证明它是存在的。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即银行资本化程度对于存活率的影响上，我们发现在借贷主要由低资本率的银行完成的省份中，僵尸企业更易存活，而正常企业则更有可能破产。

最后，我们观测了银行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分配的关系。数据显示，较低的银行资本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分配间有正相关关系，但这种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僵尸企业中。

本文原题为“Credit misallocation during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本文作者 Fabiano Schivardi, Enrico Sette, Guido Tabellini 为 vox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vox 网站。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低生产率或成新常态

Nicholas Crafts, Terence Mills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关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趋势的估计大幅度下降，这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下降是永久性下降的担忧。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以及接下来可能的结果。文章认为：第一，中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很难预测，近期的表现并不是可靠的指示。第二，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的平滑估计容易导致对前景的过于悲观。第三，中期全要素生产增长的大幅波动和预测容易混淆。编译如下：

在美国，从世纪转换之际的令人兴奋的“新经济”时期开始，生产率的增长就已经显著减速。这次的减速和在平稳的战后的几年里被反复评论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图表一）。此外，最近的很多文献已经指出生产率的增长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显著的减弱了（Cardarelli and Lusinyan 2015, Fernald 2015），并且基于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图表二）的分析也已经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在下降（Antolin-Diaz et al. 2017, Ollivaud et al. 2016）。这次的减速看起来不像是金融危机导致的暂时现象。

表一 企业部门全要素生产增长（每年百分比）

1947-1973	2.09
1974-1995	0.50
1996-2004	1.84
2005-2016	0.50

表二 生产率增长趋势估计（每年百分比）

	TFP			Y/L		
	2000	2007	2015	2000	2007	2015
France	0.7	0.3	0.3	1.1	0.8	0.5
Germany	0.7	0.5	0.5	1.1	0.6	0.2
UK	1.1	0.0	0.4	2.1	0.9	0.9
United States	1.1	0.9	0.7	2.0	1.5	1.0

同时，让人感到矛盾的是，尽管生产率的统计数据是让人沮丧的，但是这里同样也有对于数字化经济以及基于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的新兴科技的来临对就业的影响所带来的激动（也有可能是恐惧）。现在的处境让人想起了所谓的“索洛生产率悖论”30 年以前带来的很多争论。

生产率的疲弱表现和科技快速进步的共存甚至变得更加的令人困惑和担忧，当从一个增长的会计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根本原因几乎完全是因为疲弱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Fernald et al. 2017)。在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里，全要素生产增长率的上升将会导致资本累积，而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和全要素生产增长成比例的。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潜在产量增长速度预测的基础构件，且同样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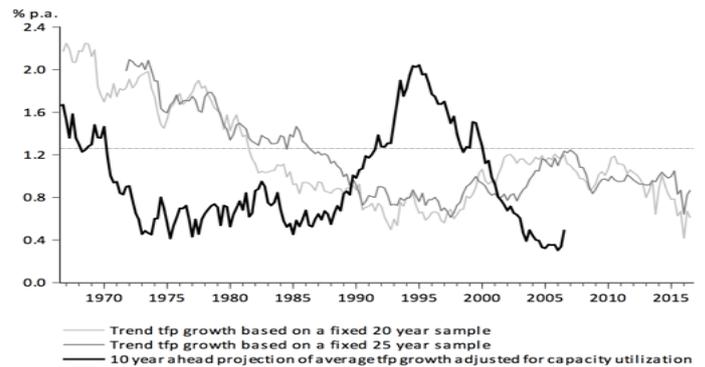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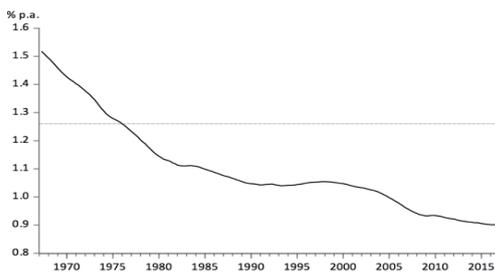
当然，权威专家对于科技进步对于未来 10 年里的生产率增长意味着什么还存在着分歧。这一部分是新兴技术的累积的经济影响预计会有多大的问题，另一部分是多久这将会成为现实的问题。“知情”意见的范围目前还很广泛，从美国经济在企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 0.4% 的增长到每年 2% 的增长。这些预测的差异是在人们相信新兴科技带来的经济影响不会让人印象深刻和人们预测一个巨大的经济影响即将来临之间的。有趣的是，提供常规预测的国会预算局大概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预测值为每年 1.1% 的增长，在 2016 年 8 月的预测值为 1.5%。

计量经济学的证据是更偏向于科技乐观主义还是科技悲观主义？我们最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全要素生产增长的估计趋势及其后续结果的历史性的观点。通过卡尔曼过滤的方法，我们用从 John Fernald 的网站上的 1947 年 2 季度到 2016 年 4 季度的数据预计出了一个美国企业部门季度全要素生产增长的未被注意的组件模型。

首先我们用了一个完整的观察样本来制造一个在图一里显示出的“平滑”的趋势增长估计。接下来，我们获得了两个固定窗口的估计（基于先前 20 或 25 年的数据），分别连续的从 1967 年 2 季度和 1972 年 2 季度开始。这次练习利用的是当时代理人可获得的数据，而不像不包括事先不能得到的未来信息的“平滑”估计。

这些趋势估计都基本上和最近生成的趋势估计的种类相同。结果如图二所示。我们也通过每一个数据点绘制出了过去十年平均全要素生产增长率。

图一 用全部样本得到的“平滑”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 图二 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估计



我们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在 50 多年里，美国企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缓慢下降但表现平稳，从 1967 年每年 1.5% 到 2016 年每年 1%。第二，根据先前 20 到 25 年的窗口对于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的预测显示出了相当大的变化，并且不会显出单一性的下降。从 1970 年代的 2% 开始，这些预测大多都处于下降趋势直到他们到达了 1990 年代 0.5% 的最低点，然后在 2000 年代中期上升到大约 1.2%，接着最近又下降到 1990 年代的水平。第三，过去 10 年间，平均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调整了产能利用率）——国会预算局所预测的范围内——也随着时间而发生了改变。结果从 1960 年代开始的每年 2% 或少一点到 1970 年代初期的 0.5% 或多一点到 1980 年代末期。这一数字接着在 1990 年中期涨到了 2% 的高点，包括了新兴经济的高度，之后在金融危机及其后果的影响下，下降到了每年 0.5%。第四，这 10 年的增长并不能很好的通过最近的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来判断。特别是，中期全要素生产增长的急速逆转并没有被提前确定下来。事实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预测会让我们错过 1970 年代的生产率减速、1990 年代中期的加速以及近年来的减速——换句话说，会让我们错过这段时期所有的主要阶段。

这些结果为我们今天对于美国未来生产率增长的前景提供了一个视角。有三点脱颖而出。第一，中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很难预测，近期的表现并不是可靠的指示。第二，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的平滑估计容易导致对前景的过于悲观。第三，中期全要素生产增长的大幅波动和预测容易混淆。

总而言之，目前还不确定美国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的减速趋势还会持续多久。然而，很清楚的是，计量经济学对于全要素生产增长趋势的估计是从最近过去的表现提取出来的且不应该在未来 10 年平均全要素生产增长率的预测中占有太多的权重。对于科技进步前景及其对于生产率的影响的观点是更有价值的，但是现在呈现出大量的分歧。

本文原题为“Economic models vs ‘techno-optimism’: Predicting medium-ter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ates in the US”。Nicholas Crafts 是 VOX 研究员，Terence Mills 是拉夫堡大学应用统计与计量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智能身份证”助力印度转移支付体系智能化

Karthik Muralidharan 等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如何确保政府的福利补贴精准地惠及贫困人口，一直是困扰印度政府的一大难题。为了推进“精准扶贫”，印度政府希望借助生物信息识别系统，来挤压其转移支付体系中存在的腐败和灰色地带，并最终推动转移支付体系的智能化。近期，一些经济学者检验了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全文如下：

Sahato 现年 25 岁，是一位居住在印度最为贫穷的恰蒂斯加尔邦的农民。早年间，他报名参与了印度政府牵头的“国家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这项计划肇始于 2007 年，计划承诺向任何来自印度农村地区的申请人提供一项每年不超过 100 天的带薪工作。这项计划的初衷是帮助那些陷入暂时困境的农民，为他们提供最后的就业安全网，助他们一臂之力渡过难关。

然而，Sahato 却意外地在这个项目中陷入了另一种“困境”——领不到工资的困境。“在 2009 年，我和另外 50 名同伴一起参与了修筑乡村公路的工作，总计 20 个工作日。”在 2012 年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Sahato 表示：“然而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政府依然在拖欠我们的工资。”

及时地向穷人支付工资，这听起来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了。然而在印度，情况并非如此。想要避免中间人的盘剥和掠夺，直接将属于穷人的工资发放下去，政府就必须付出持久不懈的努力，而印度政府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如果能够改革漏洞百出的社会保障体系，堵住腐败的漏洞，印度政府就将能够在不增加财政压力的前提下改善民生，并为执政党吸引保守派的选票。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考虑在社保体系中引入生物识别系统。比方说，如果社保机构强制要求转移支付的受益人提供指纹等生物识别信息，它们就有望大大减小发放福利时的腐败空间。

的确，全世界各国都对这种设想抱有浓厚兴趣。仅在 2013 年，全球就有 80 多个国家的政府开展了超过 230 个类似的项目(Gelb and Clark 2013)。但是，放眼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印度政府一样，对生物识别系统的应用寄予了如此强烈的希望。截至 2017 年 3 月，印度政府总计发放了超过 11 亿份带有生物识别信息的身份证，而这仅仅是印度政府宏伟的“公民身份识别计划”的一部分。印度政府的官员对这一项目寄予厚望，前财政部长公开表示：“这个计划将对印度的政治体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然而，我们也有理由对此保持谨慎。要在印度广袤的国土上推行如此复杂的系统，政府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更不要提那些多年来受益于腐败灰色地带的中间阶层，也一定会处处使绊，破坏这项计划的实施。更糟的是，这个计划还存在

“好心办坏事”的风险。一部分本应获得补助的对象可能因为硬件软件因素的不足，无法正确录入其生物识别信息，从而错失其应得的补助。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基于“公民身份识别计划”在安德拉邦（AP）的数据，对该政策的效果做了实证研究(Muralidharan et al. 2016)。安德拉邦是全印度率先展开生物信息识别系统在社保体系中应用试验的邦之一。安德拉邦政府雄心勃勃地计划在所有 pos 机中使用“智能身份证”(带有生物识别信息的身份证件)，并以此将生物识别信息全面与全社会的资本流动结合起来。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堪称是一项规模空前的社会试验。

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我们从多个角度试图检验这项试验的效果——包括其可能的益处，和潜在的弊端。我们检验的假说包括：这项试验是否影响了正常资本流动的效率？系统推行的进度是否符合政府预期？腐败的地方官员是否从中作梗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得出结论发现，这项试验的效果实在是出人意料地好。

首先，“智能身份证”如政府所愿显著抑制了腐败现象。在政府预算不变的前提下，基层的转移支付对象普遍收到了更多的补贴。我们估算，这项试验大约减少了 40%的腐败损失。

其次，受益人们的日常体验也大大改善。救济项目的参与者们普遍下调了被拖欠工资的预期，这些时间的节省带来的经济效益大约相当于每年 450 万美元。根据我们的调查，超过 90%的受访者都对新系统的效果表示满意。

当然，我们也深知，尽管安德拉邦是一个超过 8000 万人口的大邦，但安德拉邦境内政策的效果未必就一定具有全国代表性。众所周知，从行政能力和组织资源的角度来看，安德拉邦无疑是印度所有邦中的佼佼者，因此在推行“智能身份证”的试验中，安德拉邦的政策效果无疑会更突出一些。不过，安德拉邦的试验起码令我们信心大增。我们有理由相信，将生物识别信息与社保和转移支付体系全面结合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在不增加增幅财政负担的前提下增强扶贫效果，更能够显著改善印度境内极端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

本文原题为“Smartcards for smarter payments”。本文作者 Karthik Muralidharan 是印度裔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经济学教授。原文于 2017 年 7 月发表在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来我们的所见所学

Mitsuhiro Furusa / 文

导读：亚洲金融危机自 1997 年始于泰国，对亚洲经济、金融和企业产生重大的影响。现如今，亚洲抵御重大经济冲击的能力已大大增强。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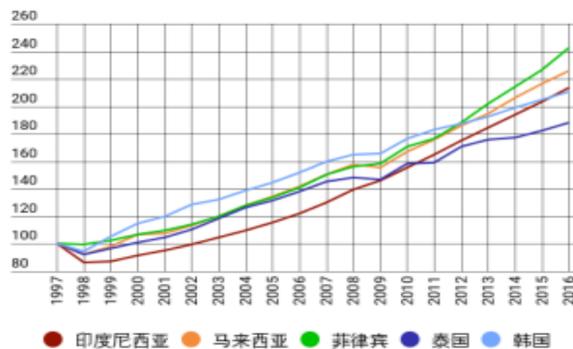
亚洲如今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由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中，亚洲拥有六个成员席位，其经济和社会成就被广泛认可。但在 20 年前，也就是 1997 年 7 月，亚洲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经济、金融和企业问题共同引发了信心的垮塌，导致了该地区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这场危机 7 月 2 日始于泰国，导致泰国放弃泰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最终还蔓延到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

值此亚洲金融危机 20 周年之际，理当抓住时机问一句：亚洲如今是否已为应对另一场重大的经济冲击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我的回答是“是的，肯定是”。当然，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漏洞，尤其是部分国家的企业和家庭债台高筑。但是总体而言，亚洲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了。请听一听我的解释。

亚洲危机无论性质还是强度均史无前例。它显现的特征包括：外部经常账户突然波动、严重萧条、失业率飙升，以及生活水平、尤其是穷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例如，印度尼西亚在一年之内的产出损失超过 13%。正如下图所示，大多数国家最初遭遇了急剧的经济衰退，不过后来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复苏。亚洲在历经这一场暴风雨的洗礼之后，焕然一新成为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反弹
亚洲国家虽然在危机后急剧下滑，但已经反弹。
(实际GDP, 1997年=100)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眼下，该地区已为应对金融动荡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事实上，重大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发生，该地区安然平稳地度过了经济低迷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和欧洲，而亚洲经济只是略有放缓。经济依然保持正增长，并且在小幅下滑后很快重新加速。

十年之后情况有什么不同呢？为了应对 1997 年危机，亚洲各国大刀阔斧地实行了改革，直击问题根源：许多国家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汇率，减轻了外部脆弱性，全面革新了金融部门监管，解决了私营部门债务积压问题，发展了国内资本市场。这些改革显然使亚洲在 2008 年具备了更强大的抵御风险能力。

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体系也在危机后实现了发展。当亚洲危机来袭，国际社会通过基金组织，围绕各项救援计划进行了动员。确实，最初设计的一揽子救援计划必须随着局势的发展做出调整；例如，经过一段时间的财政紧缩，宽松的财政政策能够减缓急剧衰退的势头。各国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和广泛实行的改革帮助重新建立了信心，为快速而持久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以这些经验教训为鉴，改进我们的政策和工具包。这些工作促成了基金组织对财政、货币和金融脆弱性评估方式以及国家规划架构方式的广泛改革。上述经验教训随后也被运用到了 2008 年危机和欧元区危机之中。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金融脆弱性的评估上。我们的贷款规划变得更加合理，着眼于消除危机的关键问题，并优先保障社会支出以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基金组织还实施了治理改革，提高了亚洲国家的投票权比重和代表性。

此外，全球金融安全网依靠双边货币互换额度和地区金融安排得以加强。1997 年危机发生后，亚洲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巩固了自身的经济防御，还建立了地区安全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基金组织也一直努力通过与东盟+3、“清迈倡议多边化”和其他多边组织开展密切合作的方式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我们的成员国还承诺向基金组织提供额外的双边贷款资源，推动其贷款能力提升到接近 1 万亿美元。

相比 20 年前，亚洲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它也面临着各项新的挑战，包括部分国家的企业和家庭杠杆比率高、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发达经济体实施更为内向的政策带来的种种风险。在这种环境下，亚洲需要一如既往地推进改革，并面向未来进行抵御风险能力建设投资。为此，基金组织积极支持成员国努力加强政策框架和追求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亚洲应当持之以恒地在地区范围内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发展更紧密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确保其仍然能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做出重大贡献。

尽管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我们仍确信，亚洲经济体已经做好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并站在更有利的位置迎接新一轮的金融风暴，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一地区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做出的改革努力。

本文原题为“[What we have seen and learned 20 years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本文作者 Mitsuhiro Furusawa (古泽满宏)于 2015 年 3 月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原文于 2017 年 7 月发表在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经常账户：外部失衡还是资本逃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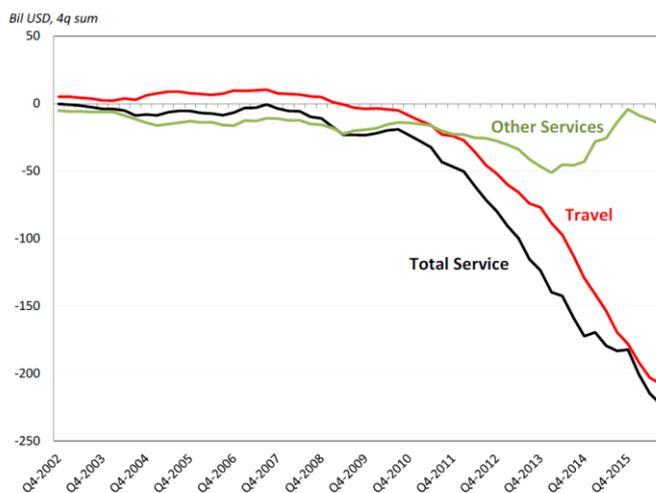
Wong, Anna /文 杨茜/编译

导读：本文探究了中国经常账户的异常情况：旅游支出大幅增长。从国际机构的数据和扩大到旅游业的重力方程模型中得出的证据，本文发现 2014 - 2016 年期间中国的旅游中有大量不能用会计因素或经济基础来解释。不明原因的旅游进口与国内增长成反比，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预期正相关，表明这个增长与国外消费商品和服务相比，更可能是国内居民收购外国金融资产。由于这些潜在的伪装外流调整，中国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的经常账户余额可能会高于官方数据 1% 的 GDP，这是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之后显著放缓的时期。编译如下：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中，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 2007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下降到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5%。从那时起，服务贸易赤字的增长使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比低于 GDP 的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 2022 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进一步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对于中国来说似乎是遥远的记忆。

服务赤字日益扩大是近期经常账户盈余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下图所示，服务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中国旅游进口或支出的快速增长。

Figure 2: Components of Service Trade Balance (4 quarter sum)



Source: SAFE

本文采取了四种方法来进行中国旅游服务进口的替代测量。第一种是镜像方法，第二种是在货物贸易文献中经常使用的重力模型，但增加了与旅行相关的解释变量。后两种模型分别是使用旅游抵达数据和经济基本面变量来预测总体旅游支出增长，然后通过官方旅行进口与刚刚描述的方法构建的进口之间的差距来估计“异常”旅行进口。

下表为四种模型的预测结果。2014 年经常项目盈余平均可能被低估了 0.7% 的国内生产总值，2015 年这一数字为 1.1%，而 2016 年则为 1.4%。另外考虑到由于方法问题引起的旅游出口潜在高估，自 2014 年以来，经常账户盈余被低估的平均水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3%，2015 年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0.7%，2016 年则为 1%。

Table 5: Summary of Potential Understatement of China's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Percent of GDP), 2014-2016

Adjustment for Disguised Outflows in Travel Imports									
	Mirror (BOP)	Mirror (Surveys)	Gravity	Arrivals	Agg Expenditure				
					Gr	Range	Midpoint	Average	
2014	0.8	0.4	0.8	0.5	1	[0.4, 1]	0.7	0.7	
2015	1.4	1	1	1	1.3	[1, 1.4]	1.2	1.1	
2016	1.7	-	1.3	1.3	-	[1.3, 1.7]	1.5	1.4	

Adjustment for Both Travel Imports and Exports									
	Mirror (BOP)	Mirror (Surveys)	Gravity	Arrivals	Agg Expenditure				
					Gr	Range	Mid-point	Average	
2014	0.5	0.1	0.4	0.1	0.6	[0.1, 0.6]	0.4	0.3	
2015	1	0.6	0.6	0.5	0.9	[0.5, 1]	0.8	0.7	
2016	1.3	-	0.9	0.9	-	[0.9, 1.3]	1.1	1.0	

* Positive = understatement.

由于进出口扭曲调整，经常账户余额将比官方统计数字大幅上涨。虽然官方经常账户余额在 2016 年有所下降，但调整后的数据表明，其可能没有下降。从这些角度来看，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外部重新平衡似乎比官方报道的反弹更为明显。

这并不否认中国对外部门再平衡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 2010 年以来一直稳步增长。事实上，即使排除了伪装的财务流出，到 2015 年，真正的中国旅游进口量增长到占全球旅游支出的 20% 左右，几乎是世界第二大旅游进口国——美国的两倍。从储蓄和投资的角度来看，2014 年和 2015 年中国经常账户的增长是由于 GDP 的投资份额比消费份额的增长更快，而在 2011-2013 年期间，消费增长速度快到足以弥补较早时期的投资减速。中国家庭财富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中国旅游支出限制逐步放缓的结合导致了中国在国外消费的快速增长，这有利于经常项目盈余的下降——这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外部再平衡。然而，随着 2014 年和 2015 年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中国富裕家庭利用旅游渠道收购外资金融资产，这些流出是国内家庭储蓄，不被国内投资吸收，因此增加了经常项目顺差。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和 2014-2016 年间的经常账户盈余情况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先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是由于购买外汇储备而出现的官方外流，而在最近私人资本外流占比增加。本文确定了近年中国经常项目服务贸易部分的异常情

况，并量化了通过服务贸易带来的伪装资本流出量。本文的分析证明近年来旅游成为中国家庭资本外逃的重要途径。伪装的家庭资本流出量很大，占 2015 年私人资本净流出的近四分之一。在中国经历大量资本净流入年份的同时，旨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鼓励资本外流的渠道开辟了可用于中国普通家庭资本外逃的机会。而随着 2014 年末中国经济增长迟缓，汇率预期逆转，中国富裕家庭开始利用这些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鉴于近年来金融账户外流压力加大，资金管制力度加大，可以想象，中国的流出量往往会通过限制不如金融账户的经常账户渗透。本文认为，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只是经常账户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可能由于伪装的资本外流而遭受更大的测量误差。

本文原题为“China’s current account: external rebalancing or capital flight?”。本文作者 Wong, Anna 为美联储新兴市场经济部门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6 月刊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货币政策导致的债务陷阱

Robert Heller /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本文作者认为，美联储的通胀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严重的财政混乱，并且将会导致未来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编译如下：

美联储正在以两种方式造成货币政策恶化：

第一，美联储错误地宣称 2% 的通胀率能使价格稳定。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通胀率的累积效应将十分显著，最终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

第二，美联储通过大规模购买联邦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所实施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已使美国逐渐陷入“债务陷阱”，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0%，偿债利率大于 GDP 的增长率。

总之，我认为，美联储的通胀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严重的财政混乱，并且将会导致未来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

2%的通货膨胀率能否保持价格稳定？

1996 年，美联储曾就长期通胀目标进行过正式的讨论，并最终同意定为 2%。15 年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正式宣布通货膨胀的目标为 2%，此后便一直认为，该目标符合国会对于价格稳定的要求。

然而，2% 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物价水平每 35 年就会翻一番。也就是说，在 70 年的正常寿命中，一美元的购买力将下降到仅 25 美分。此外，也几乎没有证据显示 2% 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或提升经济增长潜力。FOMC 的一些成员辩称，2% 的通货膨胀率将会减少不良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但却并未提供证据表明温和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是有害的。例如，大多数观察家可能认为现代科技部门是美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门之一，但是这个行业多年来也经历了相当大的价格下跌，却没有因此而遭受不良后果。

与其将通货膨胀的目标固定在 2%，或许对美联储来说更好的是将通胀目标的范围定在 0-2%。一方面，想要准确达到 2% 的固定目标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如果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目标范围在 0 到 2% 之间，那么保持利率接近于零的理由在好几年前就会消失，利率正常化的过程现在可能已经完成了。

量化宽松政策的无效性及其后果

自 2008 年以来，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通常被称为量化宽松（QE）政策，即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来刺激经济。大多数观察家同意，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这段时期，这些资产购买为金融市场提供了急需的流动性，有助于避免可能会导致更严重衰退的市场“冻结”或“锁定”。虽然最初的流动性注入有助于使金融市场恢复稳定，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 QE 期间，市场流动性不再成为问题。

在 2014 年 10 月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计划之时，其资产负债表从 7500 亿美元增长到 4.5 万亿美元，存托机构积累了 2.6 万亿美元的超额储备。由于 FOMC 没有让到期的证券“滚出”资产负债表，这些累积的资产仍然在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账面上，而巨大的过剩储备可能会导致未来经济的通货膨胀。

问题是，这种巨大的流动性注入是否能有效地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量化宽松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甚微。事实上，目前的复苏只有平均每年不到 2% 的实际增长，这是自二战以来最慢的记录。

量化宽松在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方面非常失败，并且使得美联储陷入了一个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尚未宣布任何具体政策来说明将如何缩小资产负债表以及消除经济上潜在的通货膨胀威胁。

虽然量化宽松政策的最终结果在解除之前是无法完全知道的，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由于追求低利率政策而导致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已经带来了许多负面的财务和经济后果，如金融部门的失衡和收入不平等，以及导致未来政策刺激的空间有限。

联邦债务陷阱

未来，利率必然上升，而当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时，各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面临债务陷阱。

有两个危险即将出现：第一，如果联邦预算按照目前的方式继续下去，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未来十年，联邦政府的赤字将从 GDP 的 3% 增加到 5%，联邦债务将增加 10 万亿美元。较高的债务水平将导致政府支付更高的利息；第二，随着利率的正常化，联邦的利息支付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根据这两个原因，CBO 预计，十年后，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将高达 86%，而债务总额将超过 GDP。CBO 警告说，联邦政府在支付利息方面的支出将大幅增加，生产率和工资将会降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会增加。而三十年后，CBO 预计，公众持

有的债务将达到 GDP 的 155%。这是与目前的希腊和葡萄牙相当的水平。就像这些国家一样，美国将完全陷入债务陷阱，债务水平将不可避免地上升，造成不稳定的局面。

该怎么办？

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政策行动来防止美国陷入困境？

首先，美联储应尽快将利率提高到“正常”水平，这对于目前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来说是合理的。如果美国面临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这也会给美联储提供额外的回旋余地。

第二，美联储应该让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到期时退出其资产负债表。这不会扰乱金融市场，并将逐步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从而有助于减少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

第三，美联储应该停止对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这样的转变将使银行有更多的动力去借出这些资金。

第四，联邦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经济理论不会主张在经济周期高峰附近出现严重赤字。

美国应通过削减福利项目的支出和可自由支配开支来减少赤字。此外，在消除漏洞的同时进行合理的税制改革、简化税制结构、降低过高的边际税率，将有助于减少赤字。这样的政策也会更好地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税收收入。消除不必要限制的监管改革也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动力。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美联储 2% 的通货膨胀目标不符合国会的价格稳定任务。此外，我已表明，用于实施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量化宽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无效的。这两个政策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会导致未来金融业的不稳定。除非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否则，由于联邦政府目前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赤字和利息支付，它将最终面临债务陷阱。进入这个债务陷阱可能会导致财政和金融危机，并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影响。

本文原题为“Monetary mischief and the debt trap”。本文作者是 Robert Heller，他是美国经济学家，曾于美联储任职。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进口竞争与国内产品质量

Mary Amiti 和 Amit Khandelwal / 文 史明睿 / 编译

导读：降低关税促进了国内产品向世界前沿产品的质量升级，但阻碍了质量差距较大国家的产品升级。全文如下：

企业必须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Kremer 1993,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但是，如何完成由低质量产品向高质量产品的转变呢？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进口竞争如何影响企业提高产品质量（Amiti 和 Khandelwal 2013）。我们的研究表明，更残酷的进口竞争影响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决策。对于已经生产高质量商品的公司来说，降低关税会促使他们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然而，对于生产非常低质量商品的公司来说，降低关税实际上阻碍了质量升级。我们的第一项研究表明进口竞争和质量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

如何测量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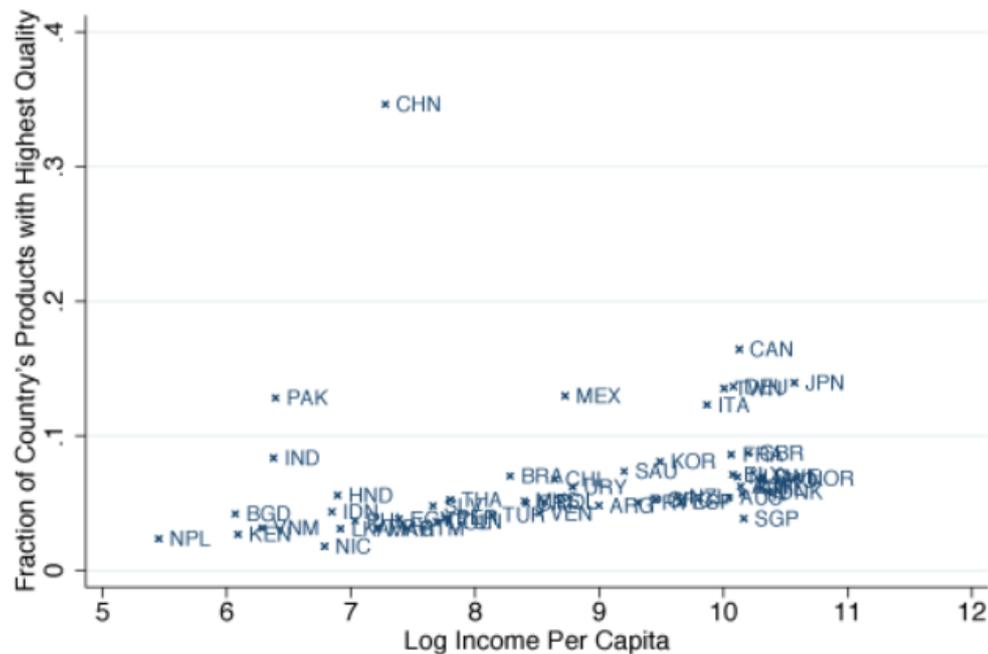
在此类研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测量质量。典型的方法是使用单位价值（价值与销售量的比值）作为质量的代表。然而，这种衡量方法的问题是，较高的价格并不一定反映出更高的质量。例如，由于存在更高的人工工资成本，较低产品质量国家仍可能设定比产品质量较高国家更高的价格。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在 Khandelwal（2010）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开发了一种方法测量质量。这种方法以价格为条件，为具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产品赋予更高的质量。

我们用出口到美国的制造业产品数据衡量质量，这些产品来自世界上 56 个国家，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统计局对 1990—2005 年间贸易中美国进口产品的统计，该局用高度分类的产品代码（涵盖超过 10,000 种不同产品），报告了贸易产品的价值和数量。许多研究发现，如果出口企业拥有最优质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可能被出口到美国。我们把每年中出口到美国各国的产品中，质量最好国家的产品定义为世界前沿产品。产品接近世界前沿产品就等价于产品的质量接近世界最高质量。因此，如果一个产品的质量很低，它的取值将接近于零；如果它是前沿产品，它的数值将接近于 1。

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我们发现，人均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产品质量更高。图 1 显示了每个国家产品与质量前沿的比例，显示出正相关关系。例如，加拿大这样的高收入国家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高质量产品。我们注意到与预测相反的一个国家——中国，作为低人均收入国家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优质商品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附加值普遍偏低。例如，Koopman 等人(2008)

的研究显示，中国出口的计算机中国内附加值只有 5%。所以，我们的计算忽略中国这一特殊情况。

Figure 1 Quality leaders, 2005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进口竞争

我们利用进口关税测量进口竞争程度，数据从世界银行“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中取得。我们的样本中涉及的 56 个国家均采用商品 HS 六位数国际标准编码，这是世界上可比性最强的商品分类方法。关税是衡量进口竞争的一个极好的替代变量，因为许多研究表明，降低关税会在自由贸易的国家里产生竞争压力，压力主要通过减少价格升高和诱导更多生产企业参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关税水平在不同的行业、国家和时间上有很大差异。例如，新加坡和挪威的平均关税仅为 5%，而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的平均关税高达 63%，在我们的样本期内，各国平均关税正在下降。

主要发现

进口关税对质量升级有重大影响，但它们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取决于该公司在其行业内距世界最顶尖水平有多远。主要研究结果总结在表 1。对于经合组织国家来说，关税下降 10 个百分点，会使更接近世界最高质量的产品质量增长 5.6%，但阻碍了那些远离最高水平的产品的质量增长。非经合组织国家虽然规模较小，但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较高质量产品的质量提高 1.3%，而质量较差产品国家反而下降了 1.1%。这些结果佐证了 Aghion 等人（2009）建立的边界模型。

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接近世界前沿，投资创新以保持领先地位是符合其利益的。然而，如果一家公司离边境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它将意识到即使投入了昂贵的成本在创新上，仍然无法赶上那些已经有高质量产品的公司。

Table 1 Effect on quality growth of reducing tariffs by 10 percentage points

	OECD	Non-OECD
Close to world frontier	+5.6%	+1.3%
Distant from world frontier	-4.2%	-1.1%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此外，我们还发现，如果国家具有最低的制度水平，那么各国的收入水平会对产品质量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有许多市场扭曲现象，仅仅降低进口关税就不可能达到竞争的效果。例如，要想实现充分进口竞争的效果，就必须有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潜力；但是，如果规定禁止上述情况发生，则充分竞争会受到影响，进口竞争将不可能实现。我们利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调查”，根据一国的监管环境衡量，我们证实，表中的结果只适用于具有高质量制度的国家。我们发现，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时适用于具有高质量制度的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但不适用于那些营商环境差的国家。

结论

我们考虑了外国竞争对国内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重点是，进口竞争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取决于产品质量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水平。低关税促进了较高质量产品的进一步升级，但阻碍了低质量产品的质量提升。这些结果的前提条件就是，一个国家必须良好的营商环境。

本文原题为“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goods”。本文作者 Mary Amiti 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副总裁助理，Amit Khandelwal 是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全球业务专业教授。原文于 2017 年 7 月发表在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洲金融危机 20 周年：被克林顿、IMF 和华尔街日报颠覆的印尼政府

Steve H. Hanke / 文 黄杨荔 / 编译

导读：本文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委员会之争进行了澄清，讲述了美国政府和 IMF 为了推翻时任印尼总统 Suharto 而编造的骗局，以及华尔街日报的不实报道。这是 IMF 在货币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最终结局也并未朝向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发展。编译如下：

1997 年 8 月 14 日，距离 7 月 2 日泰铢崩盘不久，印度尼西亚就放开了对卢比浮动的管制。时任 IMF 副总裁、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的 Stanley Fischer 表示，“IMF 对印尼当局的及时决定表示欢迎。在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下，叠加本国强劲的基本面，印尼卢比的浮动将使该国经济保持过去几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良好表现”。然而，与 IMF 的预期相反，印尼卢比未能在平静的海面上浮动——1998 年，美元兑卢比从 1: 2700 的价值跌至近 1: 16,000 的低点，印尼也陷入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漩涡之中。

1998 年 1 月下旬，时任印尼总统 Suharto 意识到 IMF 的建议并没有发挥作用，遂再次寻求帮助。2 月份，我受邀表达了观点，并被任命为 Suharto 总统的特别顾问。虽然我对当时的印尼政府没有任何意见，但对此事有明确的看法。在总统的私人住宅进行了夜间讨论后，我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建立一个正统的货币委员会，允许卢比与美元以固定汇率完全自由兑换。消息公布的当天，卢比兑美元的即期汇率和一年远期汇率都飙升了 28%，事态的发展激怒了美国政府和 IMF。

针对特别顾问和货币委员会这一想法的无情攻击接踵而至。Suharto 总统被明确告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 IMF 总裁 Michel Camdessus 都要求他放弃货币委员会的想法，否则将撤销 430 亿美元的外国援助。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针对货币委员会的想法提出每一个可以设想到的半真半假的观点。在我看来，那些反复提及的谬论被四位支持货币委员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压倒：Gary Becker、Milton Friedman、Merton Miller 和 Robert Mundell。此外，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的经济领袖、1983 年建立香港货币局的关键人物 Alan Walters 爵士，也赞同为印尼设立货币委员会的想法。

为何要为印尼的货币委员会大惊小怪呢？Merton Miller 很快理解了这场伟大的比赛。如他所说，克林顿政府反对货币委员会“并非因为它不会起作用，而恰恰因为它会起作用，如果它奏效，他们就会被 Suharto 所困”。澳大利亚前总

理 Paul Keating 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美国财政部故意将经济崩溃作为推翻 Suharto 的手段”。前美国国务卿 Lawrence Eagleburger 也有类似的诊断：“我们相当聪明，因为我们在推翻（Suharto）的时候支持了 IMF。这一做法是否明智是另一个问题。我并不认为 Suharto 总统应该留下来，但我希望他的离开是出于其他原因，而非被 IMF 赶走”。即便 Michel Camdessus 也挑不出这些评论的错，他退休时曾自豪地宣称，“我们创造了迫使总统 Suharto 下台的条件”。

为什么非要 Suharto 总统下台？克林顿总统有他的个人理由来领导政权更迭。这为前美国驻印尼大使 Paul Wolfowitz 领导的、力图改变新保守主义政权的组织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该组织意在推动美国控制从印尼延伸到摩洛哥的大中东地区。

为了推翻 Suharto 总统，两个欺骗是必要的。一是促使 IMF 形成公开反对货币委员会的立场，使 Suharto 相信他在以异端行事，如果继续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来自 IMF 的敌意经历了一个快速大转变：印尼骚乱后不到一年，保加利亚就在 IMF 的热情支持下于 1997 年 7 月 1 日成立了货币委员会。此后不久，波斯尼亚和黑塞那也于 1997 年 8 月 11 日依照《代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greement）的一项命令采取了类似做法，得到了 IMF 的全力支持。Suharto 总统下台后不久，IMF 关于货币委员会的骗局更加不攻自破。1998 年 8 月 28 日，Michel Camdessus 宣布，如果俄罗斯成立货币委员会，IMF 将对其绿灯放行。随后在 1999 年 1 月 16 日于华盛顿 IMF 总部举行的一场鲜为人知的会议上，面对 IMF 高级官员、巴西财政部长 Pedro Malan 和央行货币政策主管 Francisco Lopes 等参会人员，Camdessus 建议巴西采取货币委员会。

另一个骗局涉及一则广泛流传的故事：我曾提议将卢比汇率设定在一个高估的水平，使得 Suharto 总统及其亲信能以有利的汇率掠夺央行的外汇储备。这个骗局意在“确认”Suharto 的不正当意图，从而争取国际政治的支持以反对货币委员会的想法、推动对 Suharto 政权的颠覆，这是克林顿政府推翻 Suharto 的关键。

华尔街日报于 1998 年 2 月 10 日报道了关于高估汇率的故事，称 Peter Gontha 已经把我召集到雅加达，我已为政府准备了一份工作文件，建议将印尼兑美元汇率设定在 1: 5500。可我并不认识 Peter Gontha，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我立即尝试去纠正这一谣言，这是一个艰难且结果不令人满意的过程。尽管华尔街日报在 2 月 14 日不情愿地发布了一份修正报道，但已经造成了损害。有趣的

是，Alan Walters 爵士警告我，华尔街日报计划就印尼货币委员会和特别顾问的想法发表一份恶毒攻击。正如他写给我的：

“我从新加坡办事处获悉，华尔街日报（亚洲）可能在明天或后天对你发表攻击。据我所闻这很可耻，显然出自一些嫉妒的顾问或政客。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咨询过我，这让我很吃惊。”

更有趣的是，回顾亚洲金融危机 20 周年时，华尔街日报那个“印尼故事”的杜撰者、首席外交事务记者 Jay Solomon 再次出现。事实上，在泰铢崩溃后的 20 年中，Solomon 被扫地出门，关于他的免职，华尔街日报发言人 Steve Severinghaus 表示，“尽管我们内部的调查还在继续，但已经得出结论，Solomon 违反了作为记者的道德义务以及我们的标准”。国际先驱论坛报的 Stephens Broening 是为数不多未经审查的、以问答形式采访过我的记者之一，在其 1998 年 3 月 20 日出版的“问答/Steve Hanke, Solomon 顾问的声音”中，我驳斥了 Solomon 的虚假报道，然而一切都太晚了。华尔街日报最初的杜撰，或者说它的一些变体，在几乎所有全球主流杂志和报纸上都出现了，甚至在所谓的“学术”书籍和期刊上继续回响。李光耀在 2000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早在 1998 年 2 月，总统的儿子 Bambang，将美国经济学教授 Steve Hanke 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到 Suharto 身边，Hanke 的建议是成立货币委员会来维持卢比的低汇率。”这个错误信息真是一个惊喜，因为我从未和 Bambang Suharto 有过任何接触。

事实上，IMF 一直忙于改写货币政策历史来掩盖其中的错误，而印尼是最大的错误之一。为此，IMF 在 2001 年发布了一份长达 139 页的工作论文：《印尼：剖析银行业危机：1997-99 年的两年危险生活》，作者采用了“政治正确”版本的货币委员会事件，声称我建议 Suharto 总统将卢比兑美元汇率设定在 1:5000。这份伪学术报告包括 115 个脚注，却根本无法记录他们真实的断言。

20 年后，我们学到了什么？政权从未像预期的那样更迭。在亚洲，中国填补了美国政府和 IMF 那些不可信的努力造成的真空。那么，接受政权更迭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美国的大中东计划未来将如何演变呢？经历多次失败后，他们更加坚持自己的教义了。

本文原题为“20th anniversary,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linton, the IMF and wall street journal toppled Suharto”。本文作者为 Steve H. Hanke, Cato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Cato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的住房政策与城市发展

Emma AshFord 等/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本文讨论了美国住房现状和城市发展的关系，重点分析了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四大住宅项目，提出了收入房价比指标，指出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俄勒冈州和华盛顿等地的房价已超出居民收入可负担的能力，重点批判了各地的城市发展管理政策，并认为城市改造项目存在虚报、增加税收等问题。编译如下：

【摘要】

议会应做的事：

- 1、像 1995 年 Sallie Mae 公司一样，使 Fannie Mae 公司和 Freddie Mac 公司完全私有化；
- 2、逐步取消对抵押贷款利息的抵扣；
- 3、消除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担保的贷款；
- 4、消除州立和市立城市发展基金（urban renewal funds）
- 5、废除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将其整合到内政部（印第安住房）、商务部（救灾援助）、司法部（公平住房法）等。

国家立法机构应做的事：

- 1、废除一切与经济增长管控有关的法律，限制郡县对土地使用的控制权；
- 2、废除允许城市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资助城市改造的法律

联邦政府的四个住宅项目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关注的四大主要项目为：富人住房补贴问题、穷人住房补贴问题、住房公平以及城市更新（主要指新住宅建设）。然而，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管理下，所有项目都存在严重缺陷，没有这个机构也许国家会更好。

富人住房补贴的目的是提高住房自有率，内容包括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担保、Fannie Mae 公司和 Freddie Mac 公司（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监管）以及抵押贷款利息抵扣。但实际上，这些项目对住房自有率影响甚微。有经济学家指出，抵押贷款利息抵扣与美国住房自有率“无关”。

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提供以上补贴，但没有一个国家同时提供三种补贴。例如，澳大利亚在住房上不提供任何补贴，但住房自有率比美国高，且新建住房平均面积大于美国。巴西和墨西哥也没有任何补贴措施，住房自有率同样高于美国。

仅抵押贷款利息抵扣一项就代表每年至少 700 亿美元的优惠，其中的四分之三流向了那些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房主。另外两个项目也存在偏袒富人的情况。

国会应逐步取消抵押贷款利息的抵扣，实施更为中性、全面的减税政策。同时，应取消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担保的贷款。此外，Fannie Mae 公司和 Freddie Mac 公司应完全私有化，并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一旦经营失败，它们应该和其他民营企业一样破产。

联邦政府给穷人的补贴不及富人的三分之一，2015 年的总补贴约为 260 亿美元。即便如此，这些项目和富人补贴政策一样，毫无作用。联邦低收入住房项目包括公共住房项目、“第八章”房租补贴项目以及“第八章”相关补贴项目，而满足资格的人仅占 20%，剩下的人只能漫长地等待。这三个项目中，满足房租补贴资格的人数最多。

许多公共住房项目的问题是，大量非营利组织努力维持补贴不变，即使他们并未实际解决住房问题。例如，一个名为企业社区伙伴（Enterprise Community Partners）的组织大部分资金来自联邦拨款，但只有 21% 花在提供保障性住房上（2014 年）。

保障性住房供给 VS 住房负担能力需求

由于许多市和州都出现了住房负担能力危机，因此无论是在联邦、州还是其他地方，为穷人提供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保障性住房”指对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补贴，“住房负担能力”指与收入相对应的房价水平。衡量住房负担能力的一个标准是房价除以家庭收入（或收入房价比）的中位数。

一个家庭以高于其收入三倍的价格购买一套房子，需要还至少 30 年的贷款，每月还款额约为收入的 25%。由于银行要求购房者的还款额不能超过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收入房价比小于 3 是可以负担的，高于 3 略微负担不起，高于 4 则完全负担不起。

按照这一标准，1969 年全美国境内（夏威夷除外）的住房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当时主要城市的收入房价比率在 1.5（圣安东尼奥市）到 2.6（纽约市）之间，夏威夷的檀香山为 3.2。现今，大部分城市的住房还是负担得起，但一些主要城市的房价攀升到了家庭收入的 5 倍以上。2014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

巴拉市，这一指标高达 9.3。高指标的城市主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俄勒冈州和华盛顿。

除了纽约以外，以上这些州的共同点是都有城市增长管理的相关法律限制城市扩张边界、城市服务边界、绿化带等。纽约市房价负担不起的原因是其位于新泽西和康涅狄格的包围下，这两座城市都存在上述相关法律，租金管控以及其他法规阻止了新住房的建设。纽约州其他城市的房价是负担得起的。夏威夷在 1961 年就通过了城市增长管理法律，这也是其在 1969 年收入房价比高于 3 的原因。

除了这些州以外，许多城市也采用了城市增长管理计划，导致房价负担不起。博尔德市、科罗拉多市购买了大量绿化隔离带，丹佛市周围也有城市发展分界线。总而言之，由于国家或地方出台的城市增长管理法律，约有 40%-45% 的美国住房价格过于昂贵。

城市增长管理政策的支持者认为，该政策保护了农场和开放空间，并有助于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实际上美国的农场和开放空间相对过剩，全国有近 11 亿英亩农田，但只有三分之一农田有农作物生长。此外，由于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大豆等）每亩产量增速高于全国人口增速，农田的需求量实际上在下降。至于开放空间，美国所有人口超过 2500 万的城市只覆盖了全国 3% 的土地，即使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新泽西农村开放空间也超过了 60%。

节约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确实比较重要，但城市增长管理法律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有学者指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太小，几乎是毫无作用”。鼓励人们购买节能汽车和房屋不仅可以更好地节约能源，而且成本低，还不会带来房价高涨。

许多当地政府解决房价问题的方式不是废除城市增长管理法律，而是提供保障性住房，由此向联邦政府申请更多拨款。当然，保障性住房项目只能帮助一小部分人，而买房负担过重这一问题是由城市增长管理政策引发的。

除了严重依赖联邦住房基金拨款之外，许多城市采取保障性住房政策，从而减轻买房负担。例如，一些城市对新建住宅征税，从而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还有城市要求开发商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或出租 15%-25% 的住房给低收入家庭。这两个政策通过控制新住房建设、提高新住房成本来减轻房价负担（但这反过来会抬高二手房的房价）。

城市增长管理政策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最大，特别是黑人（黑人的人均收入约为白人的 60%），只能被迫搬到低质量的住宅区，甚至搬离这座城市。

2000-2010 年间，旧金山-奥克兰地区的人口增长了 28.5 万，但黑人人口却下降了 4.9 万。博尔德、檀香山、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等城市的黑人人口也在减少，在丹佛、波特兰、俄勒冈州等地，黑人住宅自有率逐渐下降，越来越多黑人被迫从独栋住宅搬离到集体住宅。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职责是监控住房公平，并出台了相关法规来应对各地歧视低收入家庭的土地政策。不过，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城市增长管理政策，而是致力于通过“坚定促进住房公平”政策打破区域间隔离。在这一政策下，任何接受联邦低收入住房基金拨款的城市必须纳入多个民族，如果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应采取措施减少区域隔离。

遗憾的是，“坚定促进住房公平”政策并未解决真正的问题。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隔离在全国各地都在减少。但是，在房价可负担的地区，隔离的减少是因为越来越多少数民族移居白人社区，而新社区往往本身民族融合就很好。在房价负担不起的地区，隔离的减少是因为白人因为移居到少数民族社区，致使少数民族移居到更低质量的住房。“坚定促进住房公平”政策惩罚了前者，而保护了后者。

城市改造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第四个主要项目是社区重建，最初是为了帮助重建贫民窟和其他老旧社区，这些地方环境极差，一般私人投资者不会花钱去改造。不过一些人质疑这样的社区是否真正还存在，很显然，当今很少有真正的贫民窟，许多城市甚至将完善的社区或绿色隔离带虚假上报，以获取联邦、州、和地方的财政资金。

例如，许多城市使用城市改造资金来补贴高密度的住房建设。据称，相比独栋房屋，千禧一代（伴随着电脑/互联网形成与发展一同成长的一代）喜欢在高密度住宅生活。如果是这样，就没有补贴的必要性了。事实上，高密度住宅是城市增长管理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限制土地用量。

因此，推动高密度住宅建设忽略了美国人的需求，如果负担的起的话，大部分美国人还是更喜欢在独栋住宅生活。此外，高密度住宅对环境的贡献微不足道，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节约资源、减少排放，不应为此要求美国人改变生活方式。虽然如果高密度住宅市场确实具有潜力，对其大力发展建设没有错，但这样的工程项目并不需要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

除了联邦财政拨款，大多数城市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资助城市改造，比如财产税、营业税。如果没有城市改造，这些税收本来可以拨给学校、消防部门等。当地市政府往往将其称为“免费的钱”，因为如果没有补贴，就无需征税。但有研究表明，那些增加税收的城市并没有比未增税的城市发展的更好，有可能还不如后者。这意味着通过增税的方式资助城市改造是一个零和博弈，甚至可能是赔本买卖。加利福尼亚州是最早通过增税来资助城市改造的地区，但已于 2011 年废除了该项政策，其他州也应该如此。

本文原题名为“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本文为“CATO HANDBOOK FOR POLICYMAKERS, 8TH EDITION (2017)”的部分章节，该手册由 CATO 的多名研究员共同编制。本文于 2017 年 7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IMF 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建议

IMF 政策报告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IMF 一直致力于推动各国的金融系统改革，从而加强各国金融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在最近发布的政策报告中，IMF 强调了推行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的重要性，并且总结了施行宏观审慎政策的几个要点，供各国金融当局参考。报告摘要如下：

资本流动的增加可以给国家带来诸多好处，但这同时也会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对于那些金融体系较为稳定的国家，资本流动的增加将更有利于投资和消费的增强。而对于那些金融系统安全性较为脆弱的国家，增加的资本流动则更可能引起他们的担忧。

而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推行的，以宏观审慎政策为重要特征的改革，恰恰旨在帮助各国金融系统增强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而这样的外部冲击就包括了来自资本流动的冲击。《巴塞尔协议 III》已经突出强调了银行监管中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这四大要素，基于这样的国际监管共识，各国在推行其国内的金融体系改革时应该更加注重施行稳健的宏观审慎政策，重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资本的跨境流动提供更加安全的政策保障。

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资本流动的监管意义重大。另外，宏观审慎政策也有助于各国当局在更好地受益于资本流动的同时，避免可能的系统性风险。具体而言，各国当局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先发制人地采取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这不仅可以增强金融体系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包括来自资本流动的冲击的能力，而且也可以控制逐渐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因素，防止风险要素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不可逆的系统性风险。

2、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也有利于应对资本外流带来的金融压力。尽管应对资本外流的首要工具通常是宏观经济政策，但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的配合也同样能够缓解资本外流对所在国经济造成的压力。

3、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不能限制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恰恰相反，包括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在内的各种监管体制应当大力支持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并最终惠及所在国的宏观经济。

IMF 为各国监管当局提供了两套理论框架，来确保我们宏观审慎的政策建议适合所在国基本国情。这两套理论框架（包括“宏观审慎理论”和“资本流动的制度视角”），从基本要素来看是一致的。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即是：不要使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替代品。

为了确保政策建议与这两套理论框架保持一致，对监管和调控手段进行恰当的分类是非常重要的。在详细版本的报告中（[见链接](#)），我们为各国的监管当局提供了监管和调控手段的分类原则及方法，这将帮助他们正确地制定符合其本国情况的宏观审慎监管细则，从而增强其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并且在符合 IMF 理论框架的前提下，有的放矢地降低其本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IMF 将继续深入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并将继续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各国的监管当局，从而在加强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各国在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事业。

本文原题名为“Increasing resilience to large and volatile capital flows—the role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本文是 IMF 例行发布的政策报告的摘要。完整版报告于 2017 年 7 月发表在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在华沙：介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Stewart M. Patrick/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2017年7月6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特朗普在华沙：介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一文，作者主要梳理了特朗普的讲话内容，概括为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实际上是试图通过调整他的主权意识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圈子。他驳斥了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奥巴马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正在寻找建立“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具体编译如下：

今天在波兰的重要讲话中，特朗普承诺：美国将与其盟国携手合作共同捍卫“西方文明”，规避“对我们安全和生活方式产生的威胁”。以纪念华沙起义烈士为背景，特朗普称赞波兰人民，尽管受到几十年的压迫，但是依然坚决捍卫民族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特朗普说，波兰人民反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英勇斗争也应当激励现代的西方，因为现在我们也与两个同样的危险在斗争，即“激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稳步前行的政府官僚体系”。

总统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人们自发地呼喊：“唐纳德·特朗普！唐纳德·特朗普！”，并且他的演讲赢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在解散北约呼声停止的几个月后，总统最终通过了《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称为牢固的安全保证。他建议调整联盟以打击“新形式的侵略，包括宣传、金融犯罪和网络战”。他还对俄罗斯展示了自己的强硬，即告诉莫斯科停止对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破坏活动，停止支持敌对政权，包括叙利亚和伊朗。

但是，他讲话的其他部分却令人产生不安和困惑。总统再次夸大了跨国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危险，把暴力的圣战者描述成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统治相提并论的威胁，认为其严重威胁着西方社会的生存。今天，特朗普宣称：“我们面临另一个压迫性的意识形态，一种旨在出口恐怖主义和全球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特朗普的错误在于，他接受了圣战者的荒谬幻想，即全球的哈里发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总统声称，“这种威胁……威胁到全人类。”总统夸大了诸如自称伊斯兰国家和基地组织的跨国影响力和网络能力，将安全隐患提升为美国及其盟友国需要首要应对的战略事件。不过，总统将反恐斗争集中在边境和移民安全上，而忽略了欧洲和美国最近发生的许多恐怖袭击事件具有本土化的特点。

更令人不安的是，鉴于政府过去的言论，特朗普突然发现并援引了诸如“西方”、“西方价值观”和“国家共同体”等严肃的概念。对于总统实行的外交政策来说，最让人深痛恶疾的是他正在用一种冷酷的、纯粹交易的方式来处理世界秩序。

他倾向于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接触，因此破坏了自由的、受约束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放弃了基于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基础促进西方团结的追求。总统上次访问欧洲之后，这一做法正在全面展开，其中包括五月份与北约盟国和七国集团的灾难性会议。

在这场灾难性的旅程之后，特朗普的高级国家安全和经济顾问试图在《华尔街日报》上为全球事务中采用“狗咬狗”的方法进行辩解。他们称赞总统的观点，“清晰前景，即世界不是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一个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野蛮的竞技场，友谊只是共同利益的一部分。同一个月，国务卿蒂尔森发表了一个强硬的言论，解释说，“美国第一”战略要求该国区分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政策”。

鉴于以上言论，又听到特朗普在华沙滔滔不绝的谈论“没有什么可以和与国家共同体相比”的话语很是令人惊讶。他谈到“把我们作为国家、同盟和文明联系在一起无价纽带”。这些信念包括“致力于每一个人生命的尊严，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并分享每个灵魂自由生活的希望。”实际上，特朗普希望俄罗斯能够在将来加入负责任的国家共同体，这句话与其前两任布什和奥巴马的话语相呼应。

特朗普演讲最奇怪的部分是警告西方国家，来自内部对自由的威胁不同于敌对力量或恐怖组织的阴谋行动，这是现代国家自身对自由的逐渐侵蚀。

在大西洋两岸，我们的公民面临另一个危险，其中一个在我们掌握之中。这种危险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不可见的，但对波兰人民来说却极为常见：政府官僚主义的不断蔓延，消耗着人民的活力和财富。西方之所以变得强大，不是因为文书和法规，而是因为人们被允许追逐梦想和追求自己的命运。

这些段落载有作为白宫首席战略家的替补右翼民族主义者 **Stephen K. Bannon** 以及担任特朗普高级政策顾问的 **Stephen Miller** 的所有指纹。两人在特朗普的“大屠杀”就职演说中进行了合作，并一再将他们的国内政策目标描述为“解构行政国家”。他们认为这些目标将触角伸向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破坏个人自由。

特朗普把他对于官僚政治威胁的警告与调用“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成为个人自由的先决条件。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独立的民族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甚至为了共同的目的组成联盟，但是必须避免对其国家特权、传统和文化的侵犯，包括捍卫国界。特朗普选择在波兰发布演说并不是偶然的，波兰的右翼政府一直

是对欧盟的超国家实体方面持最怀疑态度的国家之一，而且同质社会抵制大规模合法或是非法移民的流动。

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民族主义主题在总统演说中的并列位置，包括这段值得注意的段落：美国人，波兰人和欧洲国家重视自由和主权。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抵抗来自南方或东方的内外势力，这些威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破坏这些价值观，并消除联系我们文化、信仰和传统的纽带。如果不加以制止，这些力量将削弱我们的勇气，削弱我们的精神，削弱我们捍卫自己和社会的意志。

在华沙，特朗普总统实际上是试图通过调整他的主权意识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圈子。他驳斥了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奥巴马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其似乎正在寻找新的东西，即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本文原题名为 *Trump in Warsaw: introducing “nationalist internationalism”*，作者为国际机构与全球治理项目主任、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 Stewart M. Patrick。本文刊于 2017 年 7 月 6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的选择：放弃还是坚持？

James Dobbins/文章珏/编译

导读：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发起了反恐战争，但是直到现在，阿富汗的局势仍未安稳下来。阿富汗武装部队正在逐渐丢失领土控制权，塔利班势力正在日益壮大。作者认为，面对阿富汗的复杂局势，现任美国政府与上任政府一样，只拥有两项选择，要么放弃阿富汗，要么继续甚至扩大军事存在。作者进一步指出，若放弃阿富汗，则阿富汗终将成为恐怖主义输出国，因此，现任美国政府应综合考虑地区战略，维系战事僵持状态，因为，只有当塔利班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时，它才可能做出和谈选择。编译如下：

自1979年阿富汗战争开始，阿富汗这个国家就一直陷于持续的冲突之中。先是长达12年的内战，然后是16年前美国发起的那场反恐战争。

如今，在阿富汗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和其前任政府一样的一系列选择。不幸的是，并不存在输和赢的选项，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赢这个选项是无法达到的。我们能做的只是选择失去或者留住阿富汗。

现在，阿富汗武装部队正在逐渐丢失领土控制权。虽然阿富汗政府仍然控制着主要人口中心，但是塔利班在乡村地区的势力正日益上升。当2014年5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在任内撤走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时，我们就可以预见阿富汗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旦美欧联军撤离阿富汗，喀布尔政权对国家的控制力就会逐渐被侵蚀。虽然奥巴马政府从未承认过这点，但他们确实曾意图在美国撤军和当地政权垮台之间寻找如基辛格描述越战时所提到的“一段合适的间隔”。

就在奥巴马宣布撤军计划后不到两周，“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发起战争，并几乎直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一事态突出表明，美国放任当地脆弱的同盟政权独自面对暴力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这一决定，存在巨大的危险。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最终促使奥巴马再三思考其撤军计划，并最终在阿富汗留下了一个8500人的军队。因此，如何处理阿富汗冲突和是否继续维系美国的军事存在这一难题被交由下一任总统解决。

如今，特朗普政府面对以下几个选项，要么从阿富汗撤军，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阿富汗；要么维持现状，不再完全履行承诺，那么美国将慢慢失去阿富汗；要么加强承诺履行，维持战事的僵持状态，那么美国将不会失去阿富汗，这也是

美国及北约司令约翰·尼格尔森（John Nicholson）将军主张在当地额外维持一个数千人军队的理由。

在阿富汗蠢蠢欲动的暴力极端主义势力有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他们已经准备将阿富汗变成一个输送恐怖主义的港口国。

基辛格经常被人引用的另一名言是“游击队是不败即胜”。越南的情况正是如此，当美国最终失去耐心而将战争主导权转交给南越政权后，不到两年，该政权就被北约军队所击溃。

从逻辑上说，基辛格的这种说法道出了事实的另一面，因为叛乱者的目的是推翻或取代现有政权。如果这个目标迟迟不能实现，那么现有政权将最终获胜。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因各自全球野心而水火不容，相反，塔利班只关注地区目标。若是长久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最终，塔利班头目也许会选择和谈。但只要存在胜利的希望，他们便不会放弃斗争。

特朗普总统早已授权国防部长马蒂斯决定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马蒂斯有望为尼格尔森将军开拓必备讯息资源以决定是否增加美国驻军数量。他也可能为其提供空军和特种作战部队以扩大对抗塔利班势力的余地。

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其更广泛的地区战略。它可能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施压，迫使其停止为塔利班军队提供庇护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与奥巴马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应该放弃设定撤军最后期限，因为这只会激励塔利班坚持抵抗，等待美国离开的那一天。

本文原题为“Trump's options for Afghanistan: losing or not losing”。本文作者为美国前资深外交官、现任美国国务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 James Dobbins。本文刊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请最终结束朝鲜战争吧

James Dobbins、Jeffrey Hornung/文 章珏/编译

导读：1953年，美国和朝鲜签订了停火协定以“结束”朝鲜战争，但是由于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和平协定，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这场战争至今并未结束。朝鲜方面一直十分重视与美国签订明确的和平协定以获得对其主权和政权的认可，但是美国方面一直强调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才能与之签署和平协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坚持朝鲜无核化目标，而实现该目标的关键一步就是与之先签署和平协定。编译如下：

64年前，美朝双方代表签订了停火协定“结束”了朝鲜战争，但由于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和平协定，从法律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并未正式结束。

朝鲜的历任领导人都将结束这场战争视为极其重要的事。这几年，他们不断提出诉求，希望签订和平协定来解决1953年停战协议未能解决的众多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问题之一就是签订正式协议承认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

在不同的时期，朝鲜都向美国提交过谈判协议，同时也曾向韩国提交过谈判协议。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在不断推动类似谈判的展开。

朝鲜渴望达成的是一个明确的和平协定，而不仅仅是停战声明，以此获得美国、韩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于其主权和政权合法性的承认，从而保障其自身不会随意受到别国攻击。

然而，历届美国总统都坚持，必须保证朝鲜满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后，才能与之开展任何有效的和平谈判，这些前提条件包括承诺放弃核武器和停止进一步导弹试射。但是，在确信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萨达姆或卡扎菲之前，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不可能同意主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

因此，正式结束朝鲜战争，包括承认金家政权和开启美朝双边外交关系，是必要的。在我们没能明确同意结束这场陈年战事之前，我们如何能说服朝鲜领导人，使之相信他们其实不用感到害怕。

美国和西德在冷战时期也曾面临一些类似的挑战。

1974年，美国正式承认民主德国，并在东柏林设立了大使馆，但同时仍将联邦德国视为历史上的德国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并坚持其将主导德国的最终统一。

而这确实在 16 年后实现了。可以想象，美国可以创造性地采取类似的方式，通过签订和平协定，来弥合朝鲜半岛两个政权之间的部分分歧。

特朗普政府为逼迫金正恩放弃核武器采取了一系列长久措施，比如加强制裁，与中国合作施压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打击朝鲜等。如今，韩国新上台的领导人文在寅承诺将对朝鲜采取更加温和的姿态，并很可能与平壤政权开启直接对话。其实，特朗普总统本人就曾表明愿意与金正恩进行对话。

无论如何，签署一项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协定可能是任何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手段的必要部分，美国官员应当仔细考虑，如何使这项协定生效？哪些国家应该参与讨论这项协定？以及如何落实这项协定？

我们不能单纯地只追求和谈，美国不能停止军演或者放弃在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放弃军事手段可能会断送美韩之间长久的盟友关系，并可能使其他盟友怀疑美国维护地区安全的承诺。在谈判的任何阶段，美方的谈判者都应该将此牢记于心，那就是朝鲜很可能会违反承诺，这种情况在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

促使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是美国政府的根本目标，而准备好签署和平协定正式结束朝鲜战争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

本文原题为“End the Korean war, finally”。本文作者为美国前外交官、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 James Dobbins 和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 Jeffrey Hornung。本文刊于 2017 年 6 月 8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 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